

# 朋友

于光远 著

## 和朋友们 的书

2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朋友

## 和朋友们 的书

2

于光远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 2/于光远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5438-2800-6

I. 朋... II. 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书评—中国—选集 IV. ①I267②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542 号

责任编辑: 陈 敬  
          莫金莲  
装帧设计: 陈 新

##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2)

于光远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73,000 印数: 1—4,000

ISBN7-5438-2800-6

I·332 定价: 16.80 元

# 目

# 录

- 2.01 孙钿来信忆少年事…………… ( 1 )
- 2.02 一个有关程淡志的故事…………… ( 4 )
- 2.03 金岳霖说,“‘不讲逻辑’是一句骂人的话” …… ( 8 )
- 2.04 怀念吴在渊先生…………… ( 11 )
- 2.05 吴在渊的两个女儿…………… ( 15 )
- 2.06 我选修了朱香晚的“说文解字”课…………… ( 17 )
- 2.07 彭恒武师兄实现了培源师的一个愿望  
——从与自己的毕业论文告别说起…………… ( 20 )
- 2.08 普格华许会议上的周培源和其他朋友们…………… ( 22 )
- 2.09 老同学钱三强、何泽慧的一段佳话…………… ( 31 )  
附 1939年2月2日关于制造原子弹问题爱因斯坦  
给罗斯福的信
- 2.10 给韦君宜过八十大寿…………… ( 35 )  
附一 于光远:为韦君宜八十寿辰题  
附二 牧惠:《良心》
- 2.11 忆蒋南翔…………… ( 43 )

- 2.12 忆杨学诚····· (59)
- 2.13 重印艾思奇《大众哲学》序····· (68)  
附 致王丹一同志信
- 2.14 他有恩于我····· (75)
- 2.15 《袁也烈同志纪念文集》序····· (79)
- 2.16 难忘的战斗情谊····· (81)
- 2.17 陈华、陈嘉告诉我不少有关我的往事····· (87)
- 2.18 《自然辩证法》的译本是在友人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 (91)
- 2.19 我们编写了一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 (94)
- 2.20 我和黎澍几个时期的交往····· (96)
- 2.21 告别济泽····· (107)
- 2.22 九死犹未悔的温济泽  
——介绍《温济泽自述》····· (116)
- 2.23 《冯兰瑞经济论文选》序····· (119)
- 2.24 忆老柴····· (124)
- 2.25 我的第一本书是与友人合写的····· (127)
- 2.26 建国初期与友人合写的畅销书····· (129)
- 2.27 应该出一本王惠德文集····· (132)
- 2.28 响应李普同志的呼吁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应该改正  
····· (135)
- 2.29 李普兄有所不知····· (141)
- 2.30 读记胡开胡光辉事迹的《真理与命运》····· (143)
- 2.31 致李克林同志的信····· (147)
- 2.32 到陈翰笙家祝贺他百岁诞辰····· (148)
- 2.33 去陈翰笙家祝贺他一百零一岁生日····· (153)
- 2.34 他已经是跨三个世纪的大学者····· (156)

2.35	忆洪禹·····	(158)
2.36	中央宣传部理论处的同事们·····	(162)
2.37	怀念刘大年、郭敬、刘潇然、巫宝三·····	(167)
2.38	《罗劲柏集》序·····	(171)
2.39	《通俗实用经济效果学》一书·····	(173)
2.40	刘与任写了一本《国土经济学》·····	(176)
2.41	忆项南·····	(179)
2.42	会计司胡同 25 号·····	(183)
2.43	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词·····	(189)
2.44	李一氓《南·罗纪行》解读·····	(193)
	附一 李一氓：《南·罗纪行》	
	附二 于光远致丁国成的信	
2.45	他是一位年轻的老经济学家·····	(198)
2.46	杨西光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	(204)
2.47	《农村改革与中国的崛起》序·····	(212)
2.48	忆方毅·····	(223)
2.49	要有许许多多科普工作的热心家·····	(229)
2.50	关于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	(231)
2.51	《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后记·····	(234)
2.52	忆赵增益·····	(238)
2.53	题《纪念罗丽文集》·····	(241)
2.54	我常常想起竹风同志·····	(242)
2.55	迟到的鼓励·····	(245)
2.56	“方法老头”钟林·····	(246)
2.57	记病中的舟萍·····	(249)
2.58	杂文家张舟萍·····	(253)
	附 张舟萍：《风雨故人》	
2.59	《双桥集》和张舟萍·····	(257)

	附 张舟萍：《忆双桥》（节录）	
2.60	一本书里的争鸣	(268)
2.61	天津市长胡昭衡	
	——读《四个秀才一台戏》	(270)
2.62	胡昭衡与海南开发促进会	(276)
2.63	求助于篆刻艺术家	(281)
	附 戈革：《刀下留言》	
2.64	得戈革书	(285)
	附一 于光远：《猫·宠物》	
	附二 戈革致于光远信	
	附三 戈革：《水调歌头》二首	
2.65	《改革没有浪漫曲》序	(291)
2.66	我为《改革没有浪漫曲》作序	(294)
2.67	倪墨炎·《书城》·《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一）》	(296)
2.68	一本书出版的不寻常的经过	(299)
2.69	《导师和研究生的对话》若干片断	(310)
2.70	我决定收这样一位“通信弟子”	(318)
	附 于光远：《岂止朦胧而已》	
2.71	给徐唐龄的录取通知	(327)
	附 徐唐龄给于光远的来信统计	
2.72	不是文艺评论	
	——读池莉《预谋杀入》	(333)
2.73	何满子的《西行漫忆》和《“知老”下乡记》	(336)
	附录	
	朋友姓名索引	(342)

## 孙钿来信忆少年事

2000年3月我去宁波参加一个会议。从3月17日到21日住了四天，与孙钿见了面。宁波文联和作协的孙钿同我是堂兄弟。我本不姓于，他也不姓孙。我们都是上海郁氏家族的后代。在上海，我们不住在一个院子里，他家住俞家弄，我家住顾家弄。俞家弄的西口就对着顾家弄的东口，只隔开一条通往大南门的大街（上海城里的“大街”也很狭窄）。现在顾家弄也改名为俞家弄了。顾家弄里我家的西邻是孙钿的亲表弟徐本铨家，而他另一个亲表弟周国铨就住在我家房间隔壁。周国铨小名鸿宝，他就是《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一）》第一篇文章中同“七月派诗人”孙钿写在一起的那位“电子专家”。我同国铨可以说天天见面。孙钿的大名叫钟瑞，小名昌宝。小时候我们是经常见面的。

最近收到孙钿今年2000年4月26日给我写



来的信。信上除了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外，还回忆了一些他和我少年时的故事：

“真想不到我们从小在一起，到了八十多岁还能在一起，确实不容易。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在顾家弄比赛看书速度，我和国铨都比不上你，你能一目看三四行。我们惊讶吐舌，内心非常钦佩。

“我在大同附中读书时，读的学分比你低，我同杨杏佛的儿子小佛、王晓籁的女儿莲庆，以及后来在影剧界的顾而已都读相同的学分。于右任的儿子于岑也是一起的。至于刘同镇、刘同锋弟兄俩，谁是兄、谁是弟，我记不起来，总之他们俩之一也是同我读相同学分的。‘九·一八’我们上街，在小东门口站在长凳上演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刘同镇或者刘同锋在香港改名为刘以鬯，主编一个文学刊物（好像是《香港文学》）。至于葛一虹，是看了你的文章之后才知道，不过，我同他是在香港认识的。他现在在北京，我们还偶尔通信。

“你住在顾家弄，我住在俞家弄，你叫我的父亲、母亲是二伯伯、二姆妈，我叫你的父母是三爷叔、三婶妈。我很喜欢听三爷叔讲上月球去的故事，想不到半个世纪不到果真上月球了。三婶妈很疼爱我，每次见面，她总要把我拉在她的怀中。

“我有一本书是钟馥姊帮我在上海印的。那时我在香港。书是1940年出版的，名《初生期》，是同杜埃一起编成的。他的文学论著，我的小说。

“我的党龄已六十二年，能够活到今日，而且还能执笔写些译作，也是大幸。

“我翻译的《日本当代诗选》，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约于1987年出版，此书找不到了，你们的图书馆可能找到。

“去年《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有我写的一篇回忆日本的文章，名《扶桑之行》。我现在正在翻译一篇《阿垅之子

访问记》，是应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之约而译的。”

信中讲的比看书速度的事，我完全记不得了。他在前年写给我的信中，还提到我们小时候有一年中秋节一起在乔家浜东口，即小南门看“大香斗”的事。“大香斗”似乎是用柱香编成的一个容器，而这容器中又装了柱香和檀香，它可以点燃。晚上点燃之后，不但有微弱的火花，而且香味很浓，街上的秽气就一点也闻不出来了。这件事，他不提，我连香斗这样的东西都完全忘得精光了。看来我这个人的记忆是偏重于概念方面的，后来我学科学，而他能记得很多具体的事实，他的记忆偏重于形象方面的，后来他搞文艺。

收到他的信，我的确是很开心的。

## 一个有关程淡志的故事

在《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卷里，我曾经讲到过一件有关程淡志的事情，是这样记载的：

“我在北平民先总队部实际上做的是组织工作。具体说一是负责与民先地方队部通信；二是给各地方队部和关系户寄材料。

“通信的办法是，总队部按照当时掌握的各地方队部的通信地址发信。他们来信信封上写的名字是约定的总队部各式各样的化名，地址是原先讲定的许多学校，其中也包括北大。信寄到后，学校的门房照例是不送信的，而是把信插在门房墙上的布口袋里。当时帮我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两位同志，一位是郭敬堂（郭敬堂建国后曾在北京市文化局任局长，后调入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一位是王念祖（他一直在全国供销合作社当副主任）。他们骑自行车到各学校取信，把取来的信给我看，由我告诉他们如何写回信，然

后回家去写回信并寄出。

“寄材料的办法是，法政学院有四五个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组成一个小组，按照我们的要求把要发的材料按照上面提到过的地址寄出。寄的东西常常是民先总队部的文件《我们的队伍》，还有小报《解放之路》和北方局北平市委出的《长城》（后改为《新长城》）、《国防杂志》、《人民之友》等等。这些杂志并不公开表明是党的刊物，但从口气上可以看出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还有临时的单篇的文章等等。这个小组成员我记得起名字的有后来在重庆做过全国学联主席的郑代巩（他后来在一次运动中自杀了）和一位叫苏农官的民先队员。

“除了这两件工作之外，我还给民先队的小报上写点文章，当时李昌的笔名是‘金路’，我用的笔名是‘马义’。

“这个时期在北平这些青年党员之间有一个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做民先工作的人强调在众多的青年组织中间要有一个骨干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民先，它是青年组织中的左派团体，有了这个团体才能广泛团结各式各样的青年组织。我是站在这个观点立场上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这样的左派团体会受到反动派的镇压，必然变成狭小的地下组织，起不到好的作用，因此不主张去发展这样的组织。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我看到华云的一篇文章《论左派》。当时我就听说‘华云’是刘少奇的笔名（前几年编《刘少奇选集》时，我向编辑这部书的同志提出过有关这篇文章的线索，没有得到反馈。后来在长沙开少奇思想的研讨会时，我问了一下负责研究刘少奇著作的同志，得到的回答是：华云确实是刘少奇同志的笔名）。文章中讲了一篇为什么在统一战线中应该有左派的道理。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透彻，讲了我们自己讲不出来的道理。但是这篇文章的口气是党在说话，不是民先队的口气，于是我就‘动笔’在口气上改了一下，换了个题目《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中的左派》，去掉了华云的署名，铅印了单页，利用我掌握的发行系统，让法政学院那个小组寄出了。

“随随便便就把党的负责人的文章修改一通的做法，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可当时我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这么办了。

“这篇文章发出去了，后来知道在一些左派组织中反映比较强烈。香港一家李宗仁、白崇禧的报纸，想以他们自己报社的名义发表。后来发现我寄的单位比较宽，没有敢这么办。我还把这篇文章的单页卷在一捆报纸里寄给了上海的程淡志。在邮检中被查出了，特务就去找程‘谈话’。程面临着被捕的危险。程同他周围的同志商量的结果，在黄浦江畔留下一双鞋，写了一封控诉特务迫害他不得不跳江的‘绝命书’，就离开上海去了太原。由于他是大同大学的高材生，他初中毕业直升大学跳过了高中阶段，上海许多报纸对他自杀做了突出的报道。因为程是出名的好学生，大同大学的同学对特务的这种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上海有的报刊也发表评论，对当局进行谴责。由于知道他假自杀的人极少，他的朋友中就有人写信给我，对他被迫自杀表示十分惋惜。人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我惹出来的。我虽然一点也不知道真情，但是当我得到他‘自杀’的消息时，完全不相信。延安《解放》周刊第二期根据上海报纸也发表了博古同志写的一篇短评。”

我这段回忆有一点是记错了。我确实记得延安党中央办的《解放》周刊上博古同志评论中举过国民党特务找程淡志（他现改名李光，担任过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已离休。所长是王大珩院士），但不是1937年第2期，而是在第7期。在这一期刊物上，博古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如果在对日政策上可以看到某些新的气象，那么应该说：在国内民主政治的实施方面，国民党的政策是尚没有重大的变更。是的，三中全会后曾经有不少的文告：如蒋介石氏的谈话、邵力子氏的演说、中央党部之保护正当言论的训令；如国民大会

的法规的修改。除最后一点我们已屡有论及，指明其与民主主义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外，其他诸文告固未尝不堂堂皇皇。可是事实上呢？事实与文告之相距，真有隔世之感。

“爱国犯不但没有释放，而且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审判着，而且审判时禁止人民旁听。即纳粹独裁之德国在莱比锡审判时亦没有如此。这而且是对于闻名世界的救亡运动的领袖们的特殊的荣典，而普通的爱国犯、政治犯则无所谓审判，在黑暗的牢狱中，残酷的苦刑中的呻吟，受难；不仅三中全会前被捕的人犯释放无期，且在三中全会后，又有许多人被投入囹圄。上海大同大学学生程某，被密查员几次‘访问’之后，宣告失踪，似此者尚有许多。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谈不到的，相反地，许多合法存在的团体被解散了（如上海绸织工会等）。”

文中的程某就是我在大同大学的同学。他之被“密查员”访问就是由我寄他《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派》一文引起的。

2000年3月16日

**金**岳霖说，

“‘不讲逻辑’是一句骂人的话”

1995年是金岳霖诞辰百周年，出了一本《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是他八十岁以后陆续写成的。共49段六七万字。文如其人，朴素平实。序只一百多字，讲了他本人认为自己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记的。后来考虑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写了这些。有些段看了真笑死人，有一段他写的题目是《解放后让我坐办公室办公，可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他说：“解放后调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我一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

办好办坏。”还说：“到了哲学所，另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或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这以后没有多久，哲学所的同志作出决议，解除我的行政职务，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我到哲学所后，曾听见同事讨论级别问题，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可是，一次在首都医院住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人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整部书这样的趣事不少。看了这书，当时我也想仿此写五十篇，给自己画个素描，但至今没有动笔。

看了这本书我倒写过一篇超短文《好玩》：“有人问我国逻辑大师金岳霖，你为什么要研究逻辑学，金用两个字作答：‘好玩’。尽管逻辑学的意义重大，金说他本人并非因其意义重大而因其‘好玩’而研究。我了解金，他说的一定是实话，对金所说，我也有同感。一个人不必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有何意义。玩既是人生根本需要之一，好玩之事，只要无害于社会，为何不做？”

两个月前，哲学所的刘培育告诉我，五月金岳霖学术奖将在重庆举行授奖仪式，要我题几个字。我在《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中找不出来“好玩”两字，不过肯定在这本书内，因为



一我没有看过其他可能有这句话的书；二我不会无中生有，因此逻辑推论，这句话一定在这本书里。不过我不想费力去找了。但是我在这本书中找到金重视普及逻辑的言论。他对普及逻辑很重视，说了这么一句话：“逻辑是不可少的，过去说一个人‘不讲逻辑’是个很大的罪名，是骂人话。”我说“不讲逻辑”也就是蛮不讲理，的确是骂人的话。金岳霖的语言表达得是很准确的，“过去说”三个字，也就是他看到现在不把“不讲逻辑”看做什么罪名，不用这话来骂人了。我主张恢复这一句骂人话。我喜欢听到有人骂“你这个人真不讲逻辑”，也喜欢看被骂的人脸颊发红，生气也罢，羞惭也罢。现在“不讲逻辑”不成为骂人的话，是因为现在“不讲逻辑”的人太多了，特别是因为有些有权有势的人说出话办起事来不讲逻辑。

想到这点，我要为重庆那个授奖仪式题哪些字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写了“努力工作，为金先生热心的逻辑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事业奋斗”。